

序

在这举世华夏儿女欢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时候 爱泼斯坦著《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一书的英文第四版和中译本第一版问世，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因为随着香港回归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盛事的到来，香港同胞、海外华人和华侨、台湾和大陆的同胞以及各国人士都热切希望了解中国近百年来“屈辱—奋斗—胜利”的历史 而这本《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正是最适合的读物。

讲述中国近代史的中外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最适合呢？篇幅适中自然可说是一个因素，但主要的因素是由于作者的特殊经历所产生的对中国和世界事务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这种认识和感情在本书中得到最充分的、深沉的表达 从而

使本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本书的出版纪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它的英文初版出版于 1956 年 增订版先后于 1964 年和 1980 年在北京和香港印行，在此期间，它被译成欧亚 10 种文字在各国出版。

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华沙（犹太血统），孩提时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天津的租界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先后在英国学校和美国学校上学 接受的是所谓“欧洲中心”的教育 宣扬殖民侵略的“光荣史”，而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则完全抹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后来在 30、40 年代都过着记者生涯，采访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让我从少年时期受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并产生了把我已知的和未知的事物放在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渴望。”

本着这种寻求真理的精神，他阅读了大量史料并访问了许多人物和地方 包括 1944 年突破封锁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从 1938 年起 他为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同这位为继承和发展孙中山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女性建立了长达半世纪的友谊。所以爱泼斯坦对中国和中国百年革命的了解和见地，是把历史记载同现实生活相互印证而得出的，因此是最可信服的。

爱泼斯坦有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便利，又加上他的勤奋，所以他能够发掘和使用的外国史料，比一般中国作者要多，这是本书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这方面的具体事例，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随处可以感到，这里就不征引了。

历史在前进。旧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香港的和平回归是一个突出的标志）。但是，殖民时代思想的残余还会长期存在或以某种新的形式再现。例如，还有人为殖民主义辩护，还

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西化”等等。因此，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轨迹，正确了解和认识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仍然是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为此，爱泼斯坦为本书的这一最新版本写了很长的“前言”和“后记”，以帮助读者在了解了中国的百年史实之后，再进一步辨析当前各种思潮，以深化认识。

爱泼斯坦是我素所钦佩的至友，他治学严谨，坚持真理，以八十二高龄而孜孜兀兀，勤奋工作一如往昔。我衷心祝贺他这本书新版的出版。我特别高兴的是他采纳了我的建议，出版本书的中译本，以满足中文读者的需要。我还要感谢老翻译家符家钦同志，他欣然接受并在短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这一相当繁重的翻译任务，感谢今日中国出版社工作同志为赶出本书所作的努力。

让我们再一次为香港回归祖国欢呼！愿本书新版本的出版成为举国同庆中一朵小而明亮的礼花吧。

黄 华

1997年4月

于北京

作者前言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初版印行于 1956 年，1964 年和 1980 年又在北京和香港推出增补修订版。1997 年的这一版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从初版印行以来，在中国和国外，先后印行过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荷兰语、德语、印地语、意大利语、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乌尔都语 10 种译本。英文原版还在印度重印过一次。

第三世界的人民对本书的反响似乎最为强烈。许多跟我初次见面的朋友，都说他们读到过这本书。

读者中还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名誉主席，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喜欢过这本书，1961 年她给我信中说：“我见着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时，他热情地称道过这本书。”^①

读者中还有研究中国的西方作家，其中有

宋庆龄 1961 年 11 月 10 日致作者信。

斯诺。他说：“这本书把这么重大的主题写得这么精练，而所持的观点，则是西方国家著作中非常罕见的。”^①

我举出这些反响，不是的自我表扬，而是要说明，这本小书的确达到了它的目的。中国这个世纪风云变幻的繁复程度，要把它完全写出来，那真要写成一系列大书。而本书的意图，正如斯诺所说，是让受过西方教育的读者，听到一些“非常罕见”的说法，让他们“换换变速档”。从他们学过的历史书中，找到些他们从未听到过的东西。总而言之，用毛泽东的生动说法，提醒他们“需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益于他们了解现实的底蕴。

这种观点新颖的书，西方已出现过许多英文本著作，发掘出了不少连在西方也被忽视的史料。这类史料不仅写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和其他被侵略国家，也写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的史实。同样重要的还有，各民族之间争取进步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这些斗争有些是出于有意，有些只是出于历史牵连所带来的。

撰写这本书，对我本人也是一种自我的再教育。我生长在旧中国的天津，那是外国人管理的一块土地。我接受的教育，在那个时代，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对殖民侵略者的行为，洋洋得意地百般辩护。我十多岁时上一家英国人办的中学，学校中很少人说中国话，更不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课程。相反，在天津英租界里，有不少街道是以外国侵略者名字来命名，如埃尔津路、戈登路、西摩路。连我们学校里的楼也有许多洋人名字。这种到处可见洋人名字的现象，对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等于每天都在心灵上受到侮辱。

^① 斯诺 1955 年 5 月 25 日致作者信。

世界上的事情，总在变化。特别是我后来在 30、40 年代都过着记者生涯，采访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让我从少年时期受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并产生了把我已知的和未知的事物放在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渴望。

本书在 50 年代初版以来，似乎就在读者心目中点燃了星星之火，让他们对一切重新估价。从那时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对人们也是件清除幻想的工作。最大的变化是新中国的迅速成长；另一个变化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爆发了争取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斗争的连锁反应。而如果不是中国在这方面得到巨大突破性进展的话，战前那种殖民帝国还会苟延残喘，不致遭到重大挑战。

在用英语撰写中国史方面，情况也有了变化。再也没有人公开吹嘘欧洲中心论了。了解中文并能直接查阅中文资料的人，也不例外。然而，在历史界却出现了另一派人，他们也爱对帝国主义和被推翻的旧中国统治阶级说三道四，其中有些研究北京学的专家，竟然感慨地说，中国真是不幸，它错过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如果不曾错过的话”，今天的形势会大有不同。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中国早期主张洋务派的人，就为清廷找到西方化的路子。后来的美国也主张中国发展私人银行，来代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半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等等等等。

现在的学院派已经具备了用计算机管理、涵盖全部中国知识的条件，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提出各种“如果”“可能”。他们避免探索的只是，为什么事实的发展总与他们的说法完全不同，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引导的革命，和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竟然如此不同凡响。原因到底在哪里？

对于这一点，某些学者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无可避免的结

局。他们还说，中国早晚都会走上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 这是走向长远发展的唯一常规道路 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至于别的道路，则都是反常的。就连社会主义本身，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资本的一种模式。在某些国家 私人资本没有大量积累起来 从而发展资本主义就只能成为泡影。从事这项研究的人 其动机显然是 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实践上 都是此路不通。这种论调从苏联解体以来 调子越唱越响。

但这类分析家对一项基本事实 假装视而不见 即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本身 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 封闭了像中国和类似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一切历史上的“如果”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中国在一百多年来其他一切可能选择办法都告失败后，只能采取的正确选择。

在外国列强控制中国时期，特别是早期，帝国主义史学家，往往并不隐讳殖民者侵略统治时期以强凌弱的残酷罪行。在他们看来 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因为他们是优秀民族 对劣等民族当然如此。后来 当他们在民族革命、社会革命浪潮下 处于守势时 也不得不承认 列强曾经干过一些坏事。但，即使在不得不承认胜利的革命派有其合法性时 也还说 他们本来并非存心不善 或者 干过些好事，一般成果还可以 只不过有些冲突原是可以避免的 而这一点 倒是那些起而反抗外国统治的人 该负主要责任。

90年代又出现了一派以哈佛大学哈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为代表的辩护人。他们说，未来的大战里，已经不是民族与政治观念的战争 而是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 即白人的文化与有色人种的文化。这种说法意味着他们又退回到欧洲中心论者的老路。或者说，种族主义者的老路。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这次新版，用英文和中文两种版本问世，它正巧赶上历史上一个真正前进的时刻，即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一件盛事，把 1840—1841 年英国夺去的香港在经过一百年不义战争，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之后，胜利收回。这一百年，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了漫长的艰苦奋斗，而后取得民族独立。本书正文开始于鸦片战争，结束于全国解放。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才能在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中国遭受百年欺凌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1949 年建国之后，又过了近 50 年，才取得香港回归。而且这还是后来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政策带来的结果，它还还为台湾与大陆统一创造了条件。就是说，香港与台湾都可在未来 50 年间，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大陆方面，当然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并使之日趋完善。

应该插上一句从 60、70 年代以来，西方那些北京学专家的“也许”“可能”派，包括苏联在内，他们都说中国没有走上革命的“正规”道路，而严酷的事实是以苏联的革命为例，王明这帮人奉若神明，其结果屡遭挫败，如果中国依照他们的道路走下去的话，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再度沦为受人摆布的地位。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社会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所以，环境条件不同，发展的模式也随之千差万别，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未来还将证明，作者也深深相信，前苏联的解体，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已经整体消亡，而只是一起个别的特例。以为它可以成为普遍的形式，其实这样的模式是从来就没有过的。所谓的普遍性，

只能靠一个社会在前进中自己去探索。

中国已经走上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比原来设想的更长，也更为错综复杂。它虽然有多种经济成分，但并不等于把现代化与私有化等同起来。目标是在现代世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欢迎外国投资，容许它获得利润。由于中国及其制度不再受到别人控制，中国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主权、平等地位，可以得到确保，这一点是无可讨论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非常明显。旧中国不能抗拒外国的入侵。新中国的武装，恰恰也是用于自卫。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也没有基地。还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对待其他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也不论它实行什么制度，中国对之一贯采取平等和互惠的政策。

关于其他方面 请看本书的“后记”。

爱泼斯坦

1997年4月

第一章

古老中华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涌现了许多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杰出战士，还孕育了不少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哲学家、诗人和军事战略家。这些华夏健儿把中国物质文明推进到很高水平。他们熟练的农耕技术养活了大量人口。众所周知，他们的工业和科学发明有造纸、蚕丝、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陶瓷制品。此外，比起欧洲来，中国领先几百年的技术还有：

使用煤作为燃料。

深井采盐和天然气（似今天应用于油田开采石油油气的原理）。

冶金工艺中采用自然流水驱动的水轮活塞

鼓风箱。

机械学上的差动齿轮和钟表装置。

造船上使用尾柱舵、密封舱和明轮。

敞肩拱桥、悬索桥和运河闸门。

察觉地震的地动仪。

算盘、高度精确的圆周率及数学上的二项式定理。

战争中使用的弩、火炮及火药火箭。^①

中国人开始炼铁并不早。但由于他们首先用煤作燃料，因而在这项重大技术方面进展很快。公元 1 世纪罗马史学家普林尼在他的《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里指出在罗马时期中国铁器的精良品质是举世无与匹敌的。^②这位罗马人还把中国称为 *Serica*，即丝绸之国，说明当时中国丝绸非常出名，成为两个帝国间的贸易品种。

事实上，中国生产技艺领先于西方，几乎长达两千年之久。像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对中国贸易中居然使用纸币，感到吃惊。因为在那个时代，哪一个国家也没有使用过纸币。虽然马可·波罗到底是个商人，只对纸币感到兴趣，而未注意到当时钞票以及书籍，都是印制出来的，而中国发明印刷术的重要性，在欧洲也居于领先地位。直到 18 世纪末所有旅行家谈起中国来，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

然而，没有多久，欧洲的变革就证明，尽管中国技术领先地位不管历史有多悠久，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它很快就会被另

^① 关于这方面的其它发明，见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中国科学与文明》(剑桥版) 中文译本从 1954 年起已有多卷问世。

^② 见《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1958 年, 伦敦版)。李约瑟教授说：“在 5 世纪至 17 世纪期内，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在铸铁、炼钢的技术改进方面，得到很大进展，其中许多是欧洲人从未想到过的。在中世纪，除中国之外，也不可能找到如此丰富的钢铁供应来源。”

一种新的制度，例如资本主义，迅速超过。中国封建地主统治的历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但很快便在欧洲社会面前，被人列入“落后”的行列。从此以后，西方的教授便喋喋不休地说，中国甚至整个东方社会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说法既不科学，还具有沙文主义的意味。提出这种论调的原因，本来就是为资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亚洲制造借口，说侵略是为了传播“文明和进步”。后来有些人出于对东方现在的革命感到恐惧，又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这种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这种制度必然将取代资本主义，原因不在于它有什么进步性，而只在于它是“东方专制”的化身。^①

认为东方专制是根据“水力社会”形成的（指东方中央集权的专制，控制了全国灌溉系统）。这跟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一样，它也追求着同样的目标，即向人民灌输这样的思想：人类只有某一部分人的发展形式，才具有道德价值。此外的一切人种都是卑劣、“异己”、威胁成性。其实，这是很古老的政治手腕，说某些“优秀民族”比别人优越。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性，毫无科学依据。其意图只在于让帝国主义国家人民忘掉本国内部诸如进步与反动的阶级力量一类问题，从而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驯服工具。就是说，自己国家的压迫者可以压迫其他国家的普通老百姓。

从实际情况看，跟上述这种论调相反，中国的发展，跟其它社会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只是它的步调有时快些，有时慢些。中国同样是从原始氏族社会（宗族的与部族的）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只是它的发展过程比欧洲国家要早

^① 维特福格尔 (K. A. Wittfogel) 是帝国主义者宠幸的“中国史学家”。他原是共产党人，冷战时期转而侈谈地缘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提出的经济社会力量决定历史走向的学说，为麦卡锡在美国掀起“戴红帽子”政治迫害运动效力。

几个世纪而已。接着它在封建社会就停步不前，时间比欧洲封建社会长两倍，因而就落后了。

现在情况又改变了。不像欧洲，它的资本主义建立起来后，就牢牢站稳脚跟，维持了几百年而不衰，而中国则很快便推翻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制度枷锁，迅速转变成强大的、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所以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老牌的资本主义才真正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过程中，除了千百年来技术上的相对滞后外，主要的负担还在于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而不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习惯与传统，还有待克服。）

至于要问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停滞不前，中国历史学家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答案。但以下几个原因是经常被讨论到的。

第一，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尽管它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却程度不同地始终存在：

以农民来说，它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大都用于本人使用；商品未能大量流通，自然就不能摧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地主阶级从农民手中取得的地租，也大部分用于满足自己私欲和维持统治的需要。后者包括养活朝廷的大批官员，还要用于为了国内镇压人民，边疆抵御外敌而进行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所有这些开支，使得资金无法积累起来，用于投入工业和贸易。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据许多历史学家看来，中国封建社会还有些独具一格的特色：

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机构，很早就已经形成。不像欧洲那里的中央权力不能在王室和城市新生资产阶级的联盟中

居于统治地位。恰恰相反，以皇帝为首的，从首都直到乡村组成的庞大帝国官僚体系，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统率的整个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这个官僚体制，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统治集团 如许多主张“东方社会特殊性”论客那样 把这一点作为东方社会性质“基本上有差异”的一个论证。可以说，这个体制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工具，它的特点是，拥有土地的统治阶级 通过地租 或贡物 劳役、产品或金钱等方式 来剥削农民。在中国，城镇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派官员来治理，派军队来守卫的。因此，工商资本家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发展自治性的城市武装据点。不像欧洲那样，地方诸侯之间随时发生冲突。

如何看等中国封建社会这种上层建筑，把它作为这种社会的“典型”或者作为“特例”关键在于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即你用中世纪的欧洲，或中国的古代作为标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国这种形式非常精巧，其中央集权的程度之高，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大国都很难找到的。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制度为什么能维持那么漫长的时间。

有些采矿与制造业的主要部门 如铁、盐、丝和陶瓷 以及茶、马等贸易业，早就由地主国家所垄断。在这些领域里，商人只有从封建权威那里取得许可证，才能操作经营，而这种许可证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在这类严密控制的企业里，工匠大多数既不是领工资的工人，也算不上来去自由的工匠，而是国家的农奴。商人的政治地位很低，一般进不了政府的要害部门。因此，商人致富以后，并不甘心老当商人，而是想方设法打进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及其官僚机构。

在上述这种体制下，中国封建主把商人，高利贷者都变成自己的从属，三者结合成一个紧密而牢固的三位一体剥削者。

而一经牢牢结合之后，经过多大变乱，这种体制也能安然无恙。它能在无数次经济危机以及物质进步之中保存下来，使中国封建经济与技术，处于从它的科学与发明来说，既不冻结又原封不动的状态。但最后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精巧构成的上层建筑，总不能使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在漫长的阶段中保持原来状态。我们可从现代国家中找个可供对比的例子。英国的资产阶级，找到一个与贵族妥协的巧妙方法，即运用皇室铸造一个工党，使首相不能长期干下去，而要准备换班。同样，美国资本主义也不能让民主、共和两党玩他们的政治把戏，尽管两个党都受垄断资本操纵，却能成为各个社会阶层中唯一可以接受的模式。其目的还在于，使工人们以为在美国也不需要工人另组成一个自家的政党。对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政治手段可以不同，但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会熄灭，一旦条件成熟，就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古代，基本的革命阶级是农民，他们处于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统治之下。多少世纪以来，农民曾经跟强大的压迫势力，英勇不息地孤军奋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特别指出过，两千多年来，出现过 17 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小不等的起义不下几百起。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因而，只有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至于为什么尽管这些斗争推翻了王朝，重新分配了土地，却并不能改变旧的体制，原因是物质与社会的进展，还没有把一个接班人推进历史舞台。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单靠农民本身，不可能建成一个新型社会或国家政权。直到新的阶级出现并积蓄起力量，他们才能进攻和粉碎封建制度。到 20 世纪，资产阶级才

开始诞生，并在农民起义浪潮中增强实力，夺得政权，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能够推开资产阶级，带领农民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从进行反封建主义革命，直到最终结束人剥削人的制度，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最终发生的事情。但是，直到一切条件成熟之前，农民起义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虽然它对封建主义的打击也能刺激生产力和其它进展，时机到来时，能够创造革命传统，取得最后的胜利。

自然，资本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存在过的。特别是在 17、18 和 19 世纪初期，资本主义萌芽过、发展过。商品交易有过某种程度的发展。在明朝（1368 - 1644 年）曾将封建租税和劳役合并成单一的货币税，用银元支付。官方可命令农民种植棉花；把生意人组织起来，或资助他们开纺织厂，有的厂工人达到几百人。对外贸易也开始发展。接着清朝（在西方入侵之前）光广西省矿工就达到 1 万人 广东省有 5 万纺织工人。制茶业出现大作坊。有的工人超过 5 千人。江西景德镇著名的瓷窑工艺异常精致。山西省相当早就有银行信贷业务的“钱庄”，它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展业务，经营汇兑、存款、贷款，有时还是国家收税的代理人。

所有上述现象，都证明马克思所阐述的，各种社会阶段演变的顺序，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是社会进化的趋势。但如上面指出的，有的地方可能推迟一些。因此，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崩溃，并非由中国的资本主义来完成，而是通过外来的因素。再说，我们还应该看到，外来的因素还限制了、削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18 世纪中叶后 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它在征服印度之后 变成了在“中国贸易”大捞一把的带头人。在对华的贸易中，中国只是英国

制造品的供应来源。它输出的只是茶、丝、棉织品、陶瓷和其它制成品。作为回头货，中国进口的不多，大都是生皮、药品原料和富人餐桌上的食品。

1796年，乾隆皇帝答复英皇乔治三世要求增加贸易的上谕中说：“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来货物以通有无。”这种说法虽然是实情，但显然出于无知。表明了清政府何等顽固昏聩。说明中国封建当权者害怕变革，对外来的新事物忧心忡忡，完全没有注意到西方的经济实力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军事威胁，更不关心新的技术可以用来加强防卫力量。

在这段期间，英国商人在中国销售额不大，而且他们采购中国商品要付出银洋。银洋也有段血腥历史。它是美洲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工在鞭子抽打下开采出来，大部用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种植园主偿付英国人从非洲拐卖黑奴的款子。英国人拿到这笔钱后，又用于在印度收买好衣料和香料。在征服印度以后，又从印度人手中把这些银两用强制贡金办法榨取回来。这样一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展，从奴役抢劫一个民族得来的银两，转过来又可用于奴役抢劫其它民族。